

海外華人社會文化的田野調查經驗： 以金門社群為例

江柏煒*

一、作為僑鄉的金門

金門(Quemoy)，舊稱浯洲、浯江等名，由金門島、烈嶼(小金門)等島群所組成，坐落於臺灣海峽西側、福建廈門灣外，戰略地位重要。

16世紀中葉以後，金門海外移民記載散見於地方史料。《金門華僑志》指出明代隆慶、萬曆(1567-1620)之後，本地已和安南、暹羅、呂宋等地交通往來頻繁。¹部分族譜亦有17世紀中葉以降的出洋記載。²不過，方志及族譜並不足以充分顯示海外移民情況，因此實際的田野考察可以幫助了解跨境移動的歷史現象。

其中，海外華人社群的公共墳山——義山或義莊是非常關鍵的線索。田野調查發現，馬六甲三寶山上有7座早期金門人的墓，最早為1772年過世的陳坑陳巽謀之墓；在長崎，1628年由泉漳船主所興建的福濟寺，後山有閩南人為主339座墓碑，其中可確定祖籍者，金門人有84座，數量居冠。³簡言之，在1840年之前，金門人已往來於東南亞、東北亞等港口城市。

1860年起，金門海外移民規模持續擴大，直到1940年代中期。內部經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¹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60)。《金門華僑志》，金門：編者出版，頁95-96。

² 如烈嶼《護頭方氏族譜》中載有「莆陽開烈派十一世(方)善玉移居南洋生茂攻，(方)寧玉遷澎湖為瓦硯派始祖……」，從澎湖瓦硯移民時間來推估應在1650-80年間。清道光元年(1821年)《浯江瓊林蔡氏族譜》記載明代族人「往東埔寨、卒東埔寨……」、「十八世(蔡)士振長子諱竈字允慎，生於東埔寨，……丁卯年尋回。」等，推算至少於1687年以前即已出洋。

³ 長崎福濟寺後方山坡墓園有一處收納了閩南籍為主船員、匠人等之墓碑。現存共339座，以男性居大多數，計290座。籍貫方面，金門人與同安人最多，分別是84座及83座，亦有少數是非閩南籍，不過有128座字體模糊、無法辨別或沒有註明祖籍地。在可讀墓碑之中，年代最早的金門人是卒於1748年的石旭○。



濟困頓與政治動盪的因素，是向外發展的推力；而東南亞殖民地經濟的興起，是吸引移民到來的拉力。其中 1915 年至 1929 年間，短短 14 年內，金門人口減少 41.45%（男性減少 43.35%、女性減少 39.06%）。⁴

20 世紀中葉以前金門鄉僑的足跡遍及東南亞諸邦及日本，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檳城、雪蘭莪巴生、馬六甲、柔佛新山等；汶萊；印尼雅加達、泗水、邦加勿里洞、三馬林達、峇里巴板等；菲律賓中部宿務、民答那峨島的駕牙鄺、依里岸、越南西貢（胡志明市）、泰國曼谷、緬甸仰光等，部分則散居日本長崎、神戶以及香港等。⁵

二、華僑家族的案例研究：日本神戶王家、菲律賓依里岸（Iligan, Lanao）薛家

王賡武指出，海外華人一開始他們的本質是「僑居社群」（sojourning communities）而非「定居社群」（settling communities），這既與「落葉歸根」的儒家文化觀念一脈相承，又與僑居地不穩定、不安全的政治現實密切相關。⁶換言之，戰前多數的海外華人懷抱著落葉歸根、衣錦還鄉的心理期待。

因此，在近代華僑家族的研究中，我注意到一種特殊現象：家族成員在地理上並不居住在一起，但經濟上卻盡可能維繫共同體的運作。也就是說華僑家族作為一種分散家族（dispersed family），仍與家鄉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繫，包括不定期的書信往來、僑匯或返回家鄉，以維持家族的完整性。部分富有的華僑領袖還捐資修葺宗祠、祖墳、寺廟等，或者創辦學校、造橋鋪路，有時也投入公共衛生、風俗改良、治安維持、實業發展等領域，扮演了一種不同於傳統社會仕紳（gentry）的商紳（merchant-gentry）的角色，也建立一種源自於家族主義、進而擴大為宗族性或地緣認同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for lineage or communal identity）。⁷

因此，探究戰前華僑的歷史，除了關注他們在僑居地的經濟活動或社會

⁴ 金門縣政府（2009）。《金門縣志》續修，金門：編者自印，頁 43。

⁵ 江柏煒（2005）。〈僑鄉史料中的金門（1920s-1940s）：珠山《顯影》之考察〉，《人文與社會研究集刊》17 卷 1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頁 179-180。

⁶ Wang, Gungwu. (1991).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Wang, Gungwu ed.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pp.79-101.

⁷ 江柏煒（2004）。《閩粵僑鄉的社會與文化變遷》，金門：金門國家公園，頁 57-62。

生活之外，也應該重視他們在僑鄉所發揮的影響力。在這樣的思路下，我以「散居共同體」(a diasporic community) 的概念重新思考華僑家族的運作機制，以及他們在僑居地及僑鄉的社會文化建構過程。

日本神戶王家是其中一個很好的案例。約在 1868 年間，原籍金門山后的王明玉(又名國珍，1843-1903 年)東渡日本。時年約 25、26 歲的王明玉，坐上開往長崎的遠洋帆船(唐船)來到日本長崎港，初在「碇」這個地方下船。1871 年(明治 3 年)，王明玉移居大阪、神戶，設立貿易商號「復興號」。1885 年王明玉向神戶海關登記，他的申請書內容為：「今本人在神戶海岸通 2 丁目及大阪川口本田町開設復興字號，擬販賣上海諸港口之貨物，就以上貨物出入報關、納稅等事宜，請閣下照會神阪海關長並予批准，現將印章另附別紙，謹此奉上。」⁸ 申請之際，由金門同鄉、出身英坑的黃禮蘭之商號廣駿源號擔保之。

王明玉以連鎖式移民模式，將王家第二代帶到日本發展。除了努力打入日本社會(如王敬祥 1902 年入籍、王敬濟 1903 年入籍)，並因熱心國民革命事業(如王敬祥)、參與公共事務(王明玉、敬祥二代父子領導了神戶八閩公所、福建商業會議所長達 52 年之久；王敬斗於 1925 年任中華會館理事長及 1927 年任神阪華僑教育統一協會副委員長、王敬施於 1936-38 年任福建公所理事等)而在神戶僑界或日本社會享有崇高地位。他們的海外事業在 19 世紀後期至 20 世紀上半葉達到高峰。

為了維繫散居共同體的運作，復興號的海外所得在 1876 至 1900 年之間，持續匯款返鄉，興建了一座新僑村——山后中堡，以及興建了 16 座住宅分配給族人，並建有宗祠與學堂各一，供宗族共有使用。為了不讓家族爭產導致事業分崩離析的情況發生，復興號在王明玉晚年之際也進行分家，1902 年擬定的〈復興本號行規條約〉基本上以兼顧「照房祧」(per stirpes)及「照丁份」(per capita) 的傳統原則來分家，但又考慮下列 4 個因素：(1) 對商號較有貢獻的家族成員多分配一些；(2) 復興號接班人(王敬祥)分得參股，是多數兄弟的兩倍；(3) 對商號有功之外姓人士，亦可分得股份；(4) 預留公共的部分貳股，作為家族共同持有。

⁸ 神阪中華會館編(2000)。《落地生根：神戶華僑と神阪中華會館の百年》，東京：研文出版，頁 35-36。



圖一（左）：神戶福建會館前身（福建商業會議所）石碑；（右上）：神戶大靈苑王家墓園；（右下）：金門山后中堡（神戶復興號橋村）

王明玉作為近代成功華僑的典型人物，保有了濃郁家族主義觀念。金門山后王家復興號從 1880 年代晚期崛起，到 1940 年初太平洋戰爭之後沒落，在長達半個多世紀之間，成功地將家族血緣及地緣關係轉化成事業共同體的合夥關係。同時，在金門所興建的僑資聚落，正是這種散居共同體的物質文化實踐。儘管，散居共同體的維繫十分不易，落地生根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但戰前華僑所欲維繫的一種「離而不散」的網絡關係，仍然值得我們關注。（圖一）

菲律賓亦有類似的案例。19 世紀中葉起，有不少金門移民僑居菲律賓各地的記載，集中於中部的宿務（Cebu）及民答那峨的依里岸（Iligan, Lanao）、駕牙鄰（Cagayan）、馬尼拉等地發展。戰前金門珠山薛氏家族在依里岸所建立的米黍生意（碾米廠），是其中一個成功的案例。根據《金門薛氏族譜》載：「約在清咸同間，廈門禾山奄兜、林後兩村的薛姓與殿前村的陳姓發生械鬥，邀本村族人前去助陣，獲知兩村族人，多往呂宋，經商發財，匯鉅金以支持鬥費，歸告鄉人，族人紹鑽，聽之怦然心動，首先託奄兜族親赴菲，繼有薛百年（紹鑽之叔伯兄弟）不久均滿載榮歸，旋在廈門開設『隆記行』，並捐



圖二 (左) 依里岸華僑義山一隅；(右) 蘭佬中華學校幼稚園珠山室 (1953)

官，里人稱『大夫第』或『隆記內』。⁹因參與廈門族親械鬥而獲致出洋訊息，其實也是另一種連鎖式移民的網絡關係。經商致富之後的珠山族人，返鄉興建大宅、洋樓，蔚為風氣。

薛學翰則是第一位抵達依里岸的金門珠山人，1856年他來到這裡經營土產及什貨。包括薛學翰在內，整整家族五代成員，均出生於金門，並於10多歲來到依里岸發展。(學翰之子)如阜於1880年、(孫)永栽1898年、(曾孫)長安1908年、(玄孫)祖安(1928-2014)、祖彬(1930-)於1937年來菲。這一系薛氏家族在金門珠山興建了「下三落」等傳統大厝，不但作為歸僑落葉歸根的居所，也是光宗耀祖的象徵。當然，薛氏族人對於依里岸華僑社會有著極大的貢獻，包括蘭佬菲華商會、依里岸華僑義山、蘭佬中華學校的成立與運作，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圖二)

另外還有一個薛氏家族案例是薛永棟(又名福緣，1872-1943)、薛永浪兄弟。他們於1889年南來菲律賓依里岸，成立經營碾米、椰乾等土產買賣的永昌號(後名永昌公司)。薛永棟晚年有一篇自述〈六六回顧〉文章，提及當時18歲的他，因家境困頓，隨同村薛奠邦、薛允朝與客頭吳岩搭乘火船(蒸汽船)「南生號」，前往菲律賓馬里納(馬尼拉)，後經宿務，再輾轉到依里岸發展。這篇回憶錄幫助我們了解那個時代南渡菲律賓謀生的金門華僑的艱辛，也說明了1920年代致富之後，1928年返鄉興建洋樓的過程。¹⁰

⁹ 珠山文獻會編印(1991)。《金門薛氏族譜》，金門：編者自印，頁308。

¹⁰ 薛福緣(1991)。〈六六回顧〉，《金門薛氏族譜》，金門：金門薛氏宗親會，頁310-316。



1923年衣里岸米冬稍好，生理漸見活潑，米穀既豐收，土產有利，則貨物隨之而暢銷，所得成績，為一生最滿意之一年，共得四萬有餘，修理二落，以後四年間每年各得貳萬餘，民國十七年（1928年）建築龜山頂大樓，自三月十九日開工至九月尾完工。¹¹

這幢名為薛永南兄弟洋樓的僑匯建築，恰恰說明了散居共同體的運作機制。大哥薛永南留在金門照顧父母親，老二永棟、老三永浪赴依里岸經商，創立永昌號。永昌號的盈餘所得是屬於家族的，而非專屬永棟、永浪個人。在金門及依里岸的薛氏後人，各自保留了薛永南兄弟洋樓的分家契約（鬮書）可以作為例證。1934年薛永南辭世，遺留了薛中興一個男孩子，為了保障這一房的權利，1939年在永南三兄弟母親的主持下進行分家。

立鬮書人。金門島珠山鄉兄薛福緣六十八歲。弟薛永浪六十六歲。侄薛中興十六歲。……緣等兄弟三人，祇因產業無多，自少謀生菲島，所有在菲創設生理及物業。自民國捌年。時長兄國楚家居，無他職權。乃由母親提出討論，將在菲全盤生理，估價參萬元，由長兄抽出壹萬元。至民國十貳年，再補參仟元，從茲生理分清各人財權，自由處理。迨至民國拾柒年，由福緣、永浪出資在龜山之麓，建築樓屋。以手足情殷，自願獻出共住。……長兄國楚，於民國廿三年老病仙逝，享壽六十有六，遺下幼子中興，女金蓮、招蓮，長媳陳素賢，孫女毓芬。為此吾兄弟應負教養之責與擇配。而中興現求學菲島，陳素賢與毓芬，南渡星嘉坡。皆未能即面。現吾兄弟年齡，皆近古稀，又值事變未定……於是將公業抽出後浦路園壹坵貳仟栽，作為中興之長孫園外。餘者，分作三份，立為三鬮，當公證人之前，各抽壹鬮，而鬮內應得之業，各自領去職掌。……¹²

《薛永南兄弟鬮書》載明三兄弟相互照顧的分家原則，反映華僑家族作為一種散居共同體的運作方式，更是近代閩粵僑鄉社會的縮影。

¹¹ 薛福緣，前揭文，頁316。

¹² 《薛永南兄弟鬮書》（1939），未出版。

三、移地研究的路徑與挑戰

對我來說，田野調查不僅是收集資料的一種方法，它往往是拓展新視野、思考新的問題意識、自身與研究對象之間辯證、既有理論與在地研究對話的過程。同時，由於文獻、空間實存物與田野現場的交織，我試圖不自我局限為一個「單純」的建築學者、人文地理學者、史學家、人類學家或社會學者，我所面對的是人文社會領域的課題與現場，我當然需要跨領域的方法去發問、探究與解答。從文獻的收集、口述歷史的訪問、參與式觀察的紀錄、空間現場的測繪、各種資料地圖的製作、數位影像影音的紀錄等，只要有助於我們剖析問題、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述，這些方法應該盡可能地掌握與運用。

海外華人的田野調查，不可避免地需要移地研究。這項工作耗費人力、物力、時間，且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周延的研究設計可以盡量降低失敗的風險，包括事先對於研究背景的掌握、訪談主體的聯繫、調查對象的掌握、發問提綱的擬定、基本資料的收集（包括文獻、地圖等）、研究時程的規劃等。特別是，倘若可以事先回顧既有研究、閱讀僑鄉地方志、族譜等史料、了解相關華僑文化遺產的話，可以大幅提高口述訪談的深入程度。許多採訪的經驗顯示，研究者越能精準掌握問題與背景，受訪者所提供的回饋會更大。

當然，還有許多的細節必須克服，否則移地研究容易一事無成，如：考察地點若非交通便捷的城市，移動本身就是一件麻煩之事；又如治安不靖之地方，也需要妥善規劃行程且保持警覺。再如，在菲律賓、印尼等華文教育不普及的地方，訪談語言的運用及文字書寫均是一大挑戰。譬如說，受訪者能以閩南話、廣東話或客語說出其祖父母、父母親等人的名字，但方言（何況是口音的問題）的華文書寫往往他們就看不懂。僅以記音方式寫下的名字或地名，就可能會有錯誤。此時，配合義山墓碑的調查就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戰前墓碑多數仍以華文書寫，包括祖籍地、名字、生卒年及後代譜系等，可以得到完整的訊息，自然可以補充口述訪談之不足。

善用網絡關係是其中一個關鍵策略。舉例來說，我在進行金門社群主題的海外調查之前，會先找到金門本地家庭有海外關係者，協助先聯繫海外受訪對象。我還常常邀請金門本地人一起參與海外考察。又如，金門本地的烈嶼鄉長幫我打電話到汶萊騰雲殿的僑親，說明我即將於何時抵達，這樣一來研究團隊到現場時，可以立刻進入狀況，常常也可以獲得第一手的資料。到



了當地，再透過剛剛建立的網絡關係，進一步拓展開來，找到其他訪談對話或調查的地點。

會館或鄉團則是另一個重要路徑。神戶福建會館的成立，與金門商人有直接的關係，從戰前的王家到戰後黃家、董家等。新加坡金門會館、浯江公會更是從 1870 年代即已存在迄今，供奉的神祇，以及碑記、會議紀錄、文書、舊照片等材料仍相當一部分被保留在會館建築之內。1947 年成立於宿務的菲律賓南島金門同鄉會及 1985 年成立於馬尼拉的菲律賓金門同鄉會，也是我們了解菲華社會的金門人角色的平臺。換言之，進入會館的體系與脈絡，可以進一步掌握海外華人社會文化的變遷。

最後我想強調，跨學科整合的重要性，援引歷史學、地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空間研究等學科之長處，透過扎實的本土研究與世界史、世界學術理論對話，進而發展出具說服力的人文社會認識論，可以是臺灣研究及金門研究持續努力的目標。而我一直以來努力思索的金門海外社群在各地的分布、社會建構、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等問題，以及他們從過去到現在與金門的網絡關係，可以放在東亞區域視野重新檢視。在這樣的意義下，金門研究本身不僅是地域史的課題，也可以是區域史、國族史、東亞史及世界史的課題。